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 稿

第 一 辑

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

〔美〕拉尔夫·尔·鲍威尔

陈泽宪 陈霞飞 译

陈泽宪 校

中 华 书 局

1978年6月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 稿

第 一 辑

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

〔美〕拉尔夫·尔·鲍威尔

陈泽宪 陈霞飞 译

陈泽宪 校

中 华 书 局

1978年5月

内部参考 注意保存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 稿

第 一 辑

1895—1912 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

〔美〕拉尔夫·尔·鲍威尔

陈泽宪 陈霞飞译 陈泽宪校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华民国史组编

*

中 华 书 局 排 印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中 国 书 店 代 发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1978 年 5 月印刷 定价, 1.30 元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编印凡例

一、编印《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的目的仅在于组织协作，征求意见，反映工作进展情况。

二、《丛稿》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负责编辑。

三、《丛稿》专登有关中华民国史资料一类的稿件，供内部参考，不对外。每辑字数不定。

四、所有中华民国史初稿及其所附资料，一般都先在《丛稿》登载，广泛征求意见，然后改为定稿。但《丛稿》登载过的稿件，将来《中华民国史》一书及其所附资料不一定全都编进去。

五、欢迎投稿，但只限于中华民国史及有关资料。

六、欢迎对《丛稿》提出批评意见。

七、《丛稿》不对外展览借阅，所登文稿，不要转载和引用。

目 录

第一章	1895 年以前的中国军队	(3)
	导言	(3)
	满洲军队组织的缘起	(5)
	太平军叛乱时期	(12)
	权力结构的转换	(19)
	被忽视的年代的军事面貌	(21)
	中日战争	(27)
第二章	1895—1897 年新型军队的建立	(31)
	改革的要求	(31)
	张之洞和自强军	(36)
	北洋军事集团的起源	(42)
	有限度的军事改组	(49)
	军队的给养问题	(51)
第三章	1898—1900 年百日维新与义和团叛乱	(54)
	百日维新	(54)
	武力政变	(58)
	政治上反动而军事上进步	(59)
	义和团叛乱前夕的军事实力	(63)
	义和团叛乱	(65)
	叛乱的军事教训	(69)
	不参加战斗的人员	(71)
第四章	1901—1903 年慈禧领导下的军事现代化	(78)
	满清的维新诏谕	(78)
	袁世凯的军事政策	(83)
	湖北在军事上的进步	(88)
	其他各省的军务	(94)
	这一时期的回顾	(97)

第五章	1904—1906 年军事和官制的改革	(100)
	练兵处	(100)
	创设陆军的计划	(103)
	练兵处的条陈	(104)
	军事学堂的建议	(108)
	军衔的改革	(110)
	铁良的视察之行	(112)
	民族主义与革命	(114)
	行政改革与陆军部的建立	(115)
第六章	1904—1906 年间军事训练与组织方面的进步	(120)
	袁世凯和北洋军	(120)
	权力的斗争	(126)
	张之洞的军事政策	(131)
	对军务建设的评价	(134)
第七章	旧秩序的崩溃,1907—1911 年	(146)
	慈禧太后面面对的问题	(146)
	改革军政的重提	(148)
	派系之争	(150)
	一个时代的结束	(152)
	醇亲王监国摄政;对于权力的最后争夺	(156)
	陆军中的兵变	(161)
	荫昌在军事行政上的举措	(163)
	危机	(169)
第八章	陆军和 1911 年的革命	(172)
	对军事力量的估价	(172)
	支援武装部队的机构	(179)
	革命和袁世凯的重掌政权	(184)
	共和政权的军事政策	(190)
	革命期间的军事活动	(193)
	中华民国的成立	(198)
第九章	结论	(203)
	书目提要	(206)

第一章 1895年以前的中国军队

导 言

十九世纪的中华帝国是一个崇尚文治的东方社会，这一传统概念，一直影响着西方人的思想。可是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军阀就起着主导作用。衡量一种政治力量总是首先看支持它的军事力量的大小，也就是说，政治党派影响的大小，取决于他们所能控制的军队的数量与质量。

1946—1947年期间，我以一个军事分析员的身分在中国服役。当时，我对于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和人们关于中国军事潜力的错误概念发生了兴趣。在回到学院生活之后，我就决定对于近代中国的西式军队的发展和军人的作用进行一番研究。虽然我的最终目的是阐述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的特征和影响，但是我的研究使我深信，在对最近的事件作出正确分析之前，必须了解事件所缘起的背景。

中国近代军阀溯源于19世纪中叶太平军叛乱时期。而军阀主义，则是在中日战争(1894—1895)和辛亥革命期间文治官僚制度的表面统治结构衰颓以后萌芽的。在那些年代里，民国时代的主要军阀不是接受了军事训练，便是获得了军权，使他们在旧秩序崩溃后夺得了政权。从1895年到1912年清帝逊位的这段危急时期，是本书的研究范围。然而，由于缺乏有关从太平军叛乱到1895年这段整个准备时期的综合性著作，因此，就有必要写一章导言，为以后时期的研究奠定基础。

这本著作的基本目的有二：首先是试图描绘半私人性质的军队如何成长起来，以及军阀如何上升到能够在君主制崩溃后夺到政权的地位。上述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清朝末期为争夺武装力量而进行的斗争。其次，本书将追述中华帝国陆军现代化的过程，并对它已经取得的成就给以估价。

近百年来，中国领导人在试图增加其军事实力时，遇到了一系列严重问题。这包括工业的落后、贫困、缺乏文化、政治上的地方分权、裙带风盛行、缺少合格的军官和对于改革的抵制等。军队是社会的产物。文明社会的政治、社会组织和经济结构同它所发展起来的武力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社会特性的根本改革会在军事建设方面有所反映；另一方面，由于内外压力而必须对武装力

量进行的改革也能够改变一种文化的其余方面。要维持一个有效率的军队，非有一定的工业基础不可，而军队的规模与装备，则最后取决于供养他们的经济能力。同时，军队的社会结构，也能反映出军事职业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威信。如果士兵被看作是社会的渣滓，他们也许就会成为社会的渣滓。由于这些原则都是可以适用于近代中国的，因此必须给以适当注意。

军队的发展史，就是军队组织与训练制度的发展史。现代军队是由个体技术人员组成的高度复杂的机体，这些个体技术人员象一个球队成员那样的协同动作。各种类型的军事部队的组织形式，是根据理论和在演习与战斗中获得的经验而确定的。部队的组织结构通常决定了部队在战斗中的作用。由于采用新式武器或新式技术，一定会引起组织方面的变革，因此，军队的现有实力，多半也能根据它的结构判断出来。对中华帝国的新式军队来说，也是如此。

十九世纪初期，清朝的全盛时期已经过去，它已经处于衰落之中，可是古老的中国当时仍然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和以自我为中心的帝国，大体上处于同世界其他地区隔绝的状态。中国行政制度的许多特征——事实上也就是它的文化特征——早在公元前即已生根。到了唐宋之际，它们就更为制度化了，因此一直保存下来，其变动之少，至为可惊。而且中国的统治集团并不想真正改动旧的秩序。两千年的历史证明，儒家制度适合于中国。朝代虽几经更迭，但是儒家制度却差不多原封未动地继续存在着。

末期的清帝国是一种地方分权的专制政治，帝国被一种官僚政治所统治，在这种政治制度中，文官的地位高于武官。社会结构以家族为中心，其结果是裙带风盛行。等级制度在这里是不存在的。在理论上或法律上，一般人的晋升的障碍很少。可是，在实际上，社会倾向于分成许多阶层，官僚士大夫占有最高地位。皇帝被认为是上天之子，人类的统治者。只要他的统治还能容忍，他就是天命所归。当他的统治变为一种压迫而不堪忍受时，儒家思想也承认人民有反叛的权利。中国文明范围以外的人都被看做夷人，他们的使节是藩属国家前来进贡的代表。中国人在同其他国家交往时，是不把它们作为独立的平等国家看待的。自然，这样一种政策是为骄傲的、民族主义的、迅速工业化的西方国家所不能接受的。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西方在对华进行贸易中日益增长的利欲，冲突便成为无法避免的了。

十九世纪初期的中国军队是当时社会的产物。随着满清帝国的巩固，中国面临的不再是强大的外来威胁。这样，军队的主要任务变成了防止内部叛乱和维持地方秩序。由于多年的相对和平，导致了军队的衰退，这些分散领导的军

队,已经证明不能保卫中国边疆,抵御装备优良的敌人。

在下面将要说明,正是由于传统的军队不能粉碎伟大的太平军叛乱,又不能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保卫中国,以抵抗西方军队,才迫使中国在军事结构方面进行改革。事实上,军事制度是中国社会受到西方文明冲击首先有显著反映的方面。但是,保守势力是如此强大,旧秩序的传统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中国直到被它以前的小小的徒弟日本打败时,许多官员才认识到进行改革的绝对必要,才掀起了一个激进的改良运动。这样,1895年以后的军事现代化,就仅仅成为一次广泛的但一般是不成功的改良运动的一个方面——虽然它仍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很清楚,这些新式军队的组织结构、技术和装备都借鉴于西方。同时,也可以指出:现代军队,作为真正变革中的中国的产物,是受到了民族主义和共和主义这类西方思想的影响。当然,它同时又深受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也并不奇怪。

中国各类军队的名称甚为混乱。这个时期中国军队名称的改换,更增加了它的复杂性。因此,我曾作了一番努力,来弄清中国军队的专门名称,如有可能,便把中国军事组织的名称,译成在规模与特点方面和它最为接近的现代军队所使用的名称。

我希望这本书不仅对研究军务的人有所帮助,同时也能对那些对近代中国感兴趣,因而必须同在中国历史中出现的军事首领及其军队发生关系的人有所裨益。

满洲军队组织的缘起

1644年,善战的满族从他们的故土满洲攻入帝都,进入北京之后,统治中国达两个半世纪,这就是大清朝。这次满族入侵是两千多年以来,许多“野蛮”部落趁中国内部虚弱,累次入侵边境中最为成功的一次。满洲人在六十年内,从一个小小的边境部落扩展到足以征服伟大中华帝国的国家。在两代的时间内,能干的领导人跨过了满洲,征服了朝鲜,取得了对内蒙古的宗主权。(译注一)满清这次入侵的胜利和长期统治中国的成就,并不都是单靠武力取得的。他们还同时采用了中国人惯用的行政管理技术,外交和政治手段。但是,如果不是首先缔造了一支出色的武装力量,即使是在中国衰退的期间,要征服中国也是不可能的。

满族是一个历经百战的骁勇民族,擅长于军事。其社会结构也具有军事性

质，满人和辅助他们的人均被编入通称为旗的组织中。旗在满族的国家中不单是军事组织，它还具有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职能。不仅是士兵，就是士兵的家属，也和士兵一样被编入旗中。^①

旗的制度的缔造者是天才的军人政治家，清朝的奠基人努尔哈赤。这位能干的领导者认为建立强国的先决条件是建立一个有效率而能起作用的军事机器。1601年，他把随从人等分别编入牛录(译注二)，以后称佐领，置于黄、白、红、蓝四旗之下。这种新型组织以旗色定名。1615年时已经有二百个满人牛录。后又划成八个单位，于是，增加了一种以原有四色的旗帜镶边的旗帜。蒙古及中国本土被征服以后，满人又把蒙、汉这两个民族的降兵组织成旗。1626年成立了蒙古武装，1635年这一支武装扩大到八旗。1637年又成立了两个汉军的旗，这些也在1643年扩充为八旗。因此，八旗事实上包括二十四旗，满、蒙、汉兵各八旗。^② 旗兵大部分是骑马的射手，他们成为工业化以前一支驽悍的军队。满洲的力量虽然足以在亚洲建立一个大帝，但是在技术上同欧洲军队比，还是处于劣势。随后，旗人成为国家中享有特殊权的世袭阶级，在昔日彪炳的武功面前，业已成为停滞的标记。

占领了北京以后，旗的部队便以占领军的身分被分配到满清帝国的各个角落。其任务是使人数远居于劣势的满族能够维持其统治地位。^③ 自然，最重的兵力都驻屯于北京以及拱卫北京周围直隶境内的二十五个城市。其余的旗兵则分扎在许多省份驻防。满族故土境内也留有强大的防守部队。中国西部和西北部经常发生事故的边疆，都有劲旅防守。在中国本部驻防的旗营，则以递次扩大的三重半圆形防线，从北京向南、向西一直远远伸张到广州和四川的省会成都。只有安徽、江西、湖南、广西、贵州和云南没有旗兵驻守。除云南和贵州外，每一驻有总督的地方均驻有官阶较总督为高的将军。研究一下地图就可以看出，八旗的首要任务不是对付外来侵略，而是镇慑帝国内部的叛乱。在关内，旗兵多驻

^① 恒慕义编《1644—1912年清朝名人传略》(A.W. Hummel, ed.,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1943年华盛顿版，第1卷，1—3页，595—596页；迈可《满清统治中国的起源》(Franz Michael, *The Origin of Manchu Rule in China*)1942年巴尔的摩版，54—66页，105—106页。

^② 房兆楹：《计算清初军队人数的一种技术》。《哈佛亚细亚研究学报》(Fang Chao Ying, "A Technique for Estimating the Numerical Strength of the Early Manchu Military Force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第13卷(1950年6月号)192—193页；注①恒慕义编同书第1卷，596页。

^③ 见威妥玛：《中华帝国的陆军》，这是根据中国文件对八旗的组织、分布、官阶、俸饷与地位的广泛分析，原载《澳门月刊》(T.F. Wade, "The Army of the Chinese Empir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第20卷，1851年，第5、6、7月号，250—280页，300—340页，363—422页。

防于具有战略意义、人口集中、农业发达、商业繁盛和交通方便的地区，诸如大运河的枢纽和长江流域地区、成都平原、珠江三角洲及华北平原等地，都有驻军。^①

在这方面有兴趣的军事分析家都感到遗憾的是，除估计数字外，缺少有关清朝和中华民国军队实力的可靠资料。根据中国学者房兆楹的说法，1644年时满清总共有五百六十三个牛录。每一牛录在当时有适龄士兵三百人。总计潜在的实力约为十六万八千人。而通常的做法是，每三个人中只挑一人来服现役。1601年到1735年，满、蒙、汉三支旗兵的牛录数目逐渐增加，但是三个之间的增加速度并不平衡，到了1735年间，北京的京营共有一千一百五十五个牛录。由于常备军的实力与组织起来的牛录数目是成正比的，进行大战役时，便另组新的单位。1735年以后对旗兵的需要减少了，因此，旗兵数目直到1912年是相对稳定的。^② 据估计，1825年领官俸的官佐最少有一万零六百二十九人（按1812年的数字计算），未入流的员弁和士兵共二十三万六千零十四人，额外人员四万一千四百二十二人，工匠与随军商人五千三百二十七人。这里必须说明的是这些数字并不包括所有的旗人。因为，除上三旗以外，国家对不参与军务和民政的人，是不供养的。^③

清朝的第二支主要正规军是绿营。满清统治的早期，他们就决定建立一支汉人辅助武装来协助维持各省秩序。这个入侵者征服中国的时候，一些中国军队替他们出力作战。某些降兵被吸收到八旗中，剩下的便组成绿营的核心。不足之数，以明朝军队、自愿兵和地方团队补充。这支武装的军官，有满人也有汉人，而士兵则都是从汉人中招募来的。绿营与世袭的旗兵不同，它实行自愿入伍制。但它和旗兵一样都受先前明朝作风的影响。^④

绿营组成之后，分为陆路与水师，由骑兵、步兵、守兵组成。这支军队最大的特点是分成许多小单位而遍布全中国。其中大多数，至少在名义上受提督辖治。而另一部分则拨充总督与巡抚作为标兵。提督节制的军队分为镇标与协标和

① 参见谢宝潮：《1644—1911年的中国政府》（Hsieh Pao Chao,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1644—1911]*），1925年巴尔的摩版，64—65页；解宝贲：《曾国藩与太平军叛变》（W. J. Hail, *Tseng Kuo-fan and the Taiping Rebellion*），1927年组黑文版，3—4页。

② 见第6页注③房兆楹文，193—194页、202页、204页、208页。

③ 见第6页注③威妥玛文，252页、254页；注解宝贲文，3页。以同一资料而对军官的总数提供了一个不正确的数字（一万零五百九十一人）。

④ 《清史稿·兵志》二，1页；注③威妥玛文，392页；注④解宝贲文，8页；迈可：《太平军叛乱期间中国的军事组织和权力机构》。《太平洋历史评论》（Franz Michael, “*Military Organization and Power Structure of China during Taiping Rebellion*”,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第18卷（1949年11月），471页，在威妥玛文（见第6页注③）362—416页处，对绿营组织、官阶、任务及俸饷有详尽叙述。

营,每营又进一步划分为一些更小的单位。^①

清朝初期,绿营兵力还不固定。康熙帝时(1662—1722)编制人数约为五十九万人。绿营在全国各处的分布状况虽远比八旗正规,不过,在沒有八旗驻防的西北、华南沿海和云南等地,绿营却异常集中。1764年,绿营至少在纸面上增加到六十三万人左右。最明显的发展是它进驻贵州。到1785年,兵力核减为五十九万人左右。1812年,又增加到近六十六万人。后来,道光帝(1821—1850)降旨减少绿营人数,绿营组织也经过一番淘汰。^②1825年,兵力业已减为六十一万八千人左右。^③在1851年太平军叛乱爆发前夕,绿营兵力可能曾进一步缩减到五十八万五千人左右。^④

绿营兵力间歇性的增长,与当时军事上的对外政策和大规模内战有关。1785年的人数下降,发生在乾隆帝的主要战役结束之后;1812年的上升,则同苗族和白莲教叛乱有关。道光年代(1821—1850)实行紧缩,外交政策又软弱无力,再加上军队中的腐败,绿营的实力便不断衰退。

就绿营被划分为一大帮独立或半独立的小单位这件事来看,绿营显然只是一支大型的警备队伍,而不是战斗的力量。它的主要任务是维持治安,同时对边境上的部落和內地的苗瑶,执行绥靖职责。此外,它还有防范犯罪活动,解运金、银、钱粮、囚犯,运送邮件等任务。它在全国各地虽然都设有哨所,但是由于过于分散,很难在发生大规模内乱和外族入侵时迅速动员起来。由于这种小部队对于地方官吏很有用,任何集中较大兵力的企图都会受到阻挠。因为,这些小部队一调走,地方当局就失去必要的警卫力量。^⑤

满族开始统治时,对军队采取了相当程度的集中管理。当八旗在满洲开创时,皇上仅亲率一旗,其余七旗以亲王为旗主。1651年,顺治帝有计划地削弱皇族的权力,以增加天子的权力。于是,由天子自将三旗,是为上三旗。到雍正帝时(1723—1735),又褫夺了分属亲王的下五旗,并指定亲信掌握。绿营也基本上

^① 梅辉立:《中国政府》(W.F.Mayer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第3版, 约于1896年在上海出版), 64—65页; 波罗纳脱和哈格尔斯脱罗姆:《中国目前的政治组织》(H.S.Brunnert and V.V.Hagelstrom, *Present Da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China*)1912年上海版, 337—341页。

^② 《清史稿·兵志》二, 19—20页列有上述年代的兵员总额, 但各项数字如果分开计算, 与总数均有出入。假定各省的分别数字是正确的话, 则总数应为: 康熙时期五十八万八千一百七十四人, 而非五十九万四千四百一十四人; 1785年为五十八万八千一百九十四人, 而非五十九万九千八百一十四人。罗尔纲:《湘军新志》, 1938年上海版, 第1页称绿营在康熙时期额兵为六十四万人。

^③ 见第6页注^③威妥玛文 255页。

^④ 《清史稿·兵志》二, 20页。

^⑤ 见第6页注^③威妥玛文, 363—364页; 第7页注^①解宝贲文, 10—11页; 欧本登少将:《亚洲和欧洲的军队》(Maj. Gen. Emory Upton, *The Armies of Asia and Europe*), 1878年纽约版, 第18页。

由中枢主要是由兵部管辖。而更重要的是,军队的财务由户部控制了。^①

中国幅员广大,交通不便,因而必须分权给地方官吏。这是必要的,尽管传统的地方主义以及官吏的自私自利,会使这样一种政策有损于皇权。这种危险在1870(译注三)年由于外省发生的三藩之乱中更形显著。为此,康熙帝创立了一套互相制约的制度,以保障满族的统治。在军事方面,这个制度包括把每一省的军权分属于几个主管当局。我们已经知道将军虽然只能指挥驻防旗营,可是他的官阶却高于总督。而总督则兼领兵部尚书的官衔,巡抚兼领兵部侍郎官衔,因此他们又以武员的身分列名于兵部的册籍。(译注四)这种身分,使他们在名义上成为所辖地区的最高统帅,间接地控制他们省内所有的绿营。可是他们只能直接指挥自己属下的标兵。总督巡抚互为制约,除了某些由巡抚兼任绿营提督的省份以外,提督又成为另一制约力量。因为提督在军职上高于巡抚。他只能隶属于总督之下。提督标下的兵,差不多总是比他们文职同僚的兵力为多,可是提督所辖的总兵,有些会比他们的上司直接统率更多兵马。总兵是半独立的,他们的队伍分散各处,而且实际上是常川驻守。其次,总兵的部队,对于地方官吏极其有用。因此,地方官们反对任何足以使他们所辖地区警备空虚的兵力集中。皇帝对督抚和武将们的权力不能放心的另一明证,是二百年来朝廷一直派钦差大臣平定各省的重大叛乱。这些钦差,常是皇族的亲王或中枢大员。他们在执行军务使命时,官阶比地方官员为高。这种复杂的制度,也许非常适合康熙帝的内政需要。^②但是,由此产生的组织,在战时却几乎无用。

满族征服中国的时候,是一个矫健,骁勇的民族。旗的部队由坚强善战,充满自信,具有战斗意志的士兵组成。入侵中国以后,他们进入一个过去曾使同样强悍的战士失掉力量的环境。著名的元朝军队就是如此。作为一个征服者的民族,满人自然要设法保持他们自己的善战特征,发扬尚武的美德。但是,由于满族必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靠儒生来治理他们的新帝国,他们就维持这一阶层的威信,而这一阶层是惯用道德制裁和传统来鄙薄军人职业的。中国历史上满人是向外扩张和内部战争,历代王朝和当今的政权都靠武力建成。使用武力显然是取得最高权力最有效的办法。然而令人惊奇的是不仅他们的自己人,就连他们的被征服者,大部分也相信这样一种认识,即书生是一切美德的最高代表,而当兵的只不过是流氓而已,也许他们力大如牛,可是不见得比牛聪明。这里,必

^① 罗尔纲:《清季兵为将有的起源》。《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5卷(1937年7月),237—239页;见第6页注^①恒慕义编同书,卷1,218页及卷2,916页;迈可《军事组织》471页。

^② 见第7页注^①谢宝潮著同书,258—259、291—293、295—298页;第6页注^③威妥玛文,266—288页,第7页注^①解宝贵文,8—11页。

须指出,武弁虽是保卫王朝所必不可少的鄙夫,而儒生则不只是必须用来运用复杂的国家机器,并且还需要靠他们著书立说,宣扬、保持一种崇尚文治的思想。^①中国人民深受他们影响,从这句谚语就可以看出,即: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面对着这样一种舆论,一个少数民族,即使居于统治地位,要想保持他的尚武精神也是十分困难的。

1735年以后,乾隆帝开始依靠绿营镇压内部叛乱。1755—1759年镇压新疆叛乱是以旗兵为主力的最后一次战役。^②在一百年多一点的时间内,八旗部队就不再是帝国部队的主力,而只是作为征服者的一种标记继续存在着。它已经不再是可靠的实力保障。满人不得不依赖互相制约的制度,再加上汉人的效忠或汉人之间的相互摩擦,来保持他们的帝位。中国军事历史家罗尔纲说,早在康熙年间(1662—1722),旗人已趋腐朽,皇上就主要依靠他认为比较优秀的绿营了。于是,汉人成为朝廷的正规军,旗人退化为卫戍部队。可是,绿营在18世纪后半期积习日深,几十年后也同样不堪重用。^③满人的传统武装,在1839—1842年鸦片战争中,已证明不堪使用。十年之后,到太平军叛乱时,更腐败到完全不能击败或制止叛乱的地步,而不得不大加补充了。

清代中国军队蜕化的原因,在八旗和绿营有许多都是相同的。除了政治上和社会上的敌视气氛外,长期驻防也使军队懈怠无力,特别是旗兵的坐享特权无所事事。贪污腐化,极其盛行,尤以军官为最。兵籍簿上充满了根本不存在的士兵的名字,而现役士兵却不能按时得到应有的粮饷。有些绿营中实有士兵只有兵籍簿上所载的六分之一到一半。军事训练在建制,装备均已陈旧的军队中,成为虚应故事。军官们学习的仍是古代军事家孙子、吴子和司马(译注五)的兵法格言。纪律虽然严酷,但是执行是松弛的。上级不能约束下级。这样,军队对百姓就成为威胁。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劫掠百姓甚于土匪。将弁虐待士兵,视同奴仆。这两支队伍全都过于分散。集中训练或作战时,则从各单位抽调人力另组队伍。这样,人员背景各异,将弁往往不能合作。旗人从骁勇之士蜕化成为寄生阶级,而绿营士兵转而从事其他职业,包括为匪在内。^④曾国藩在1851年奏称,满汉士兵都与土匪勾通,并吸食鸦片,嗜好赌博。乌兰泰将军也说,军队在鸦片

^① 参看迈可:《明清统治的起源》见第6页注^①,28—29页;第7页注^①谢宝潮著同书,180、389页;第6页注^③威妥玛文417—419页。

^② 见第6页注^②房兆楹文,203页。

^③ 见第9页注^①罗尔纲文,239—240页;罗尔纲:《湘军新志》1—2页。

^④ 罗尔纲:《湘军新志》,2—15页;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1卷,13页;(日本)帝国参谋本部编辑:《中日战争史》(Imperial General Staff,compilers, *History of the War between Japan and China*),1904年东京版,第1卷,27页;第6页注^③威妥玛文,417、420—421页。

战争失败之后，元气一直没有恢复，他们把退却视为平常，认为丢失战略要地也是无所谓的。^①

军队衰颓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不能提供胜任的将弁。为了选拔将弁，建立了缜密的、在表面上相应于很被尊崇的文职科举的武科考试制度。同文官科举制度一样，经过三试，逐步从岁试乡试到北京会试。这种做法的理论根据是很可赞扬的，它规定选择将弁应该大公无私，完全按照资才，不过，实践同理想相距却很远。考试内容有关军事操练和虚应故事的笔试，包括背诵一段古典军事论文。尽管中国学者的威信很高，但科举中文章这个部分却是一个笑话。如果投考者没有学问，写不出引经据典的文章，往往可以找一个有学问的同考者枪替。真正强调的考试是膂力和武艺。包括马步弓箭、舞大刀、拉硬弓、举重石。中国人的失着是假定只须有蛮力和勇气就可以成为将才。从另一种观点看，全部程序都是无益的。至少是在19世纪末期，多数武举出身的人都没有在军队中服役，而正式的将弁则很少有人出身武科。19世纪中叶，有些官员即已建议取消这种无价值的考试。但是反对改革的力量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这种只凭膂力的考试，直到1901年才最后废除。^②

尽管这类军队没有多大用处，耗费却很大，对中国陈腐的财政结构来说，无疑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全部军费开支的数字只能认为是接近的估计。对当时员额兵饷、津贴和马乾作了仔细的甚至是苦恼的研究以后，威妥玛爵士估计19世纪中叶兵部的支出，总计为三千零八十七万四千五百四十两。其中旗兵占一千五百九十六万三千四百八十两，绿营占一千四百六十六万二千六百五十两。威氏认为，资料虽然不很充分，但假定八旗年耗一千六百万至一千八百万两是大致不差的。^③

译 注

(一) 清朝时期未分内外蒙古。

(二) 女真人出兵校猎时，不计人数多寡，各随旗党屯寨而行，至围场，每人出箭一支，十人中择一人领之，令勿离队越次，称为牛录额真。明万历29年，努尔哈齐分编三百人为一牛录，每一牛录设长一，即定牛录额真为官名。

(三) 系1670年之误。

(四) 总督为地方最高长官，职权极为广泛：无论综治军民、统辖文武、考覈官吏、修饬封疆，均为共职责所在。巡抚之职务，与总督略同，而权力则略小。

(五) 系司马法之误。

① 邓嗣禹：《对太平军叛乱史的新见解》(Ssu-yü Teng, *New Light on the History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1950年麻省，剑桥版，47页。

② 徐亦丹：《中国武科考试制度》(Etienne Zi (Hsi), *Pratique des examens militaire en Chine*), 见同书各处。

③ 见第6页注③威妥玛文，413、416页列了一个各省八旗绿营开支的图表。416页上有一处错误：八旗部队开支总数应为一千五百九十六万三千四百八十两。

太平军叛乱时期

军队的士气颓废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不幸,军事系统显著腐败的现象,恰恰反映了清代中国的整个结构正在逐渐蜕化。政治的腐败堪与军队的腐败相比拟。文官滥征赋税,榨取人民,老百姓遭受的茶毒,绝不限于帝国军队的蹂躏。暴动与骚乱频繁。官吏们关心的是在自己的任期内把事情真象掩盖起来,而不是改善人民的困苦状况。反满秘密会党活动的增加业已显示了人民对异族统治的反抗日渐滋长。经济的日趋萧条,加剧了政治和社会的不安,而这种不安又成为加深萧条的部分原因。人口随着耕地面积的扩大而增殖,同时,不公平的租佃制度也因之推广。西方的冲击从贸易的逆差——主要由于鸦片大量进口——和因此造成的中国白银外流上表现出来。由于政府的玩忽再加上天灾,饥荒更形严重。反抗旧秩序的大暴动已经成熟,而大暴动的动力就是广西太平军(又称拜上帝会)。

太平军叛乱是在忧患中产生的。它是政治、种族、土地革命和一定程度上的宗教革命,也部分地受到被歪曲了的基督教形式的鼓舞。太平军叛乱首先起于东南的广东和广西省。开始时,拜上帝会的信徒大多数是农民,同时也包括一些其他阶层的人,例如反对朝廷的士兵和少数读书人等。1851年拜上帝会首领宣布“太平天国”成立。1852年开始北上,1853年初攻克南京。^①

与朝廷的军队不同,异端的太平军具有足以振作士气,坚定斗志的政治、经济和宗教思想。而且,至少在叛乱的早期,太平军军队的领导很强,善于巧妙地制定战略和战术。当朝廷的军队依靠城墙和炮火作为防御力量的时候,太平军却在采取心理上的和实际上的攻势。首领合作、军纪严明,官兵和谐。因此,早期的太平军具有出色的集体精神。^②与官军不同,太平军的组织以这样的一种制度获得它的力量,即它原来虽然以统一于一个最高的指挥为组织的基础,可是,也容许部队的统帅在野战中保持主动和灵活。太平军对待人民群众比官军好得多这一事实,使他们能够获得必要的支持以展开初期的战役。

太平军组织仿古代的周礼,其建制则仿明代团练。它主要的军事单位是“军”,每军士卒一万二千五百人(实际上,与其称军不如称师),一军分五旅,一旅

^① 太平军叛乱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简述系根据第11页注^①邓嗣禹著同书35—61页;戴德华:《太平军叛乱》。《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G. E. Taylor, "The Taiping Rebellion,"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第16卷(1933年1月号),546—582页,587—594页。

^② 见第11页注^①邓嗣禹著同书61—66页。

分五营，每营有五百士卒，一营分五连，每连有士卒一百人。(译注一)太平军号称自己有水陆军一百三十万人，这个数字显然夸大了。他们还宣称，如包括官吏、诸匠、随军商人、百工、杂役和文职人员等在内，全军总计有三百零八万五千零二十一人。^①

太平军终于失败，这是因为它借以取得力量的上述诸因素失灵的缘故。这里，情况与清军相似，一方面贪污腐化盛行；另一方面军纪松弛，士气低落。任何统一的指挥都会被相互猜嫉，个人野心和围绕着高级统帅生长起来的小集团的活动所摧毁。许多能干首领的早死，进一步削弱了军队的实力。革命精神的丧失和人民支持的减少，以及未能赢得士绅的支持，使得太平军的基本原则在和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作斗争中遭到失败。此外，虽然比较次要，但是有影响的是支持现政府的外国军队的干涉。^②

太平军在 1851 年到 1853 年向前挺进的期间，消灭了许多绿营和参战的八旗部队。太平军早期的胜利，证实了满清正规军无力扑灭叛乱，这种情况引起了人们的惊慌。于是，长江流域便补练了许多乡勇来镇压叛乱。最早运用勇营的是乾隆帝(1736—1796)，当时勇营被用来镇压台湾叛乱和贵州苗族叛乱。18、19 世纪之交，白莲教叛乱时，也曾经起用大量的乡勇部队来协助维持秩序。尽管乡勇有所贡献，但是在战斗结束后仍被遣散。象中国时常发生的那样，政府如果无法遣散兵勇，就把他们安插在绿营之中。^③ 1830 年以来，社会上仍然存在着广泛的不满，盗匪益多，四境骚动，地方防务日急，而八旗绿营又不能胜任；因此，许多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地方集团便开始创立自己的军队，虽然这是用地方财政维持的法外队伍。迈可教授认为，在 1845 年以后，政府也承认了这些由乡绅所组织的团练，并起用它来镇压地方叛乱。在这个过程中，士绅们由于把他们的部队和改革国内腐败制度的运动相结合，从而增加了自己的力量。^④

为了解决太平军叛乱在 1850 年代所造成的严重威胁，朝廷任命了一些主要的文官或学者来募练乡勇。由此组织起来的乡勇，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最后

① 培尔司：《左宗棠，旧中国的军人和政治家》(W. L. Bales, *Tso Tsung-t'ang, Soldier and Statesman of Old China*), 1937 年上海版, 119, 121 页；第 11 页注①邓嗣禹著同书 63 页；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1951 年北京版；《清史稿·兵志》，121 页；第 12 页注①戴德华文, 596 页。

② 第 11 页注①邓嗣禹著书 66—67 页, 70—73 页。

③ 竹坞：《吾国之陆军》。《国风报》第 1 卷(1910 年), 52, 54 页；罗尔纲：《湘军新志》，15—16 页；第 9 页注①罗尔纲文 240, 249 页；沈谦认为直到嘉庆朝(1286—1820)乡勇都没有用来协助绿营与八旗部队的说法是不对的(《辛亥革命前夕吾国之陆军及其军费》。《社会科学》卷 2, 第 2 期 [1937 年 1 月] 347 页)；迈可指出中枢从未能将地方团练部队的组织完全消灭(见第 7 页注①迈可文, 473—476 页)。

④ 第 7 页注④迈可文, 473—476 页。